



北魏平城都 ②

《时间隧道中的大同古城》之一(节选)

李尔山 刘艾珍



不定的游牧族群，本是“马上英雄”。择吉地、建离宫，固然有其习性渊源。然而，拓跋珪之意图，绝非仅仅于此。正如日本学者前田正名所指出的：“南池附近地当交通要冲，东行可至浑源县，再东南折，经莎泉、灵丘，即抵中原，如此则河北平原尽在掌握；南下经阴馆，过雁门关，可达太原，由此经汾河路或其他路线前往黄河流域亦非难事；至于北面，与平城相互呼应，更不待言。”而豺山离宫择址善无(今右玉)，亦正在于扼守平城至太原的交通咽喉。由此可见，拓跋珪时期所建的离宫副中心及豺山离宫，其根本出发点，仍是一种深远的都城安全战略考量。

4. (离宫)“离宫”是汉族朝廷对于都外别宫的称谓。其与游牧民族王廷习俗中的“行帐”制度虽然本质相异，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。这对于新近入主中原的鲜卑朝廷而言，显然具有重要的过渡性意义。因此，平城新都甫一定夺，北魏离宫的建设便被提上议事日程。天兴六年(404年)，在对平城宫城与鹿苑工程作出安排之后，道武帝拓跋珪便马不停蹄，先北巡(七月)，筑离宫于豺山(在今右玉县境内)；紧接着九月，又巡行灏水(桑干河)之南，亲赴黄瓜堆战略要冲进行规划。《魏书·太祖纪》载其“行幸南平城，规度灏南，面夏屋山，背黄瓜堆，将建新邑”。此处的“南平城”，实指代国建南都平城时期，拓跋珪之高祖猗卢于313年在黄瓜堆所筑之“小平城”(亦称“南平城”)。如今，他承继先祖遗志，决意将此地肇画为平城帝都的副中心。

5. (城垣)公元409年道武帝拓跋珪去世。北魏的历史进入太宗时期(409—423年)，这一时期朝廷不再全力进行对外征讨，而把内政和都城建设当作工作重点。继太祖之后，开启了宫城、外郭、北部长城等重大项目。大规模兴建了平城的里坊，修建了西苑、东苑、南苑，疏浚了如浑水、五周川两大水系，基本上完成了平城山水人居防护一体化的格局。

城垣问题，是当年平城都主体建设之纲，也是今天平城研究中争议最激烈的问题之一。争论的要害是：平城之城垣体系究竟有几层墙体？由于《魏书》等权威历史文献，对于平城“宫城”和“外郭”都有具体且不容争议的记载，而未见中间层次的明确记述或说法，于是焦点更集中于“中间一层墙体到底存在与否？”的问题之上。主流观点认为平城城垣由宫城、外郭(官方文件称谓)、郭城“三重”城环环相套而成，可称为“三重城”论——此论以辨析“外城”为目标，在自我“认定”的基础上，声言“平城”在汉、晋都城二垣体系之上，首开“三重”先河，是隋唐三重城体系的“领头羊”。故而占据论辩的“制高点”，登高而招，从者甚众。笔者详细研究三重城论者的观点，知其内部又细分为两派，分别依所引论据不同，称为“外城”论和“中城”论。

①“外城”论的核心论据是：《魏书》道武帝天兴三年(406年)六月条：“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灏南宫，门阙高十余丈，引沟穿池，广范围；规立外城，方二十里，分置市里，经涂洞达。三十日罢。”此条记录，本文在“离宫”一节中曾作为黄瓜堆副中心的建设内容引用过。但“三重城”论者认为：这条记载的后半段“规立外城，方二十里……”并非指灏南工程，而是指平城的“外城”，特别强调其中有“外城”二字，称其是特指平城中间城垣的。为了强调这种“拆分”解释的正确性，论者还引天兴三年另一条记载：“发八部人，自百里内缮修都城，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。”借此说明此次“发八部人”之役，是一项“百里之内”的都城总体工程。既包括平城之“外城”工程，也包括灏南工程。

②“中城”论的核心论据是：《魏书·

世祖纪》太武帝天延五年(439年)条：“(蠕蠕)吴提果犯塞，贼至七介山，京邑大骇，争奔中城。”论者认为，柔然犯境，邑人避入“中城”，这个“中城”就是他们要找的平城城垣体系中的“中垣墙体”。至于“中城”从何而来？论者也没有再去纠缠“黄瓜堆”的那条“外城”设计，而是另指泰常八年拓跋焘做太子监国时于“癸卯，广西宫，修外垣墙，周回二十里”者即是。关于此条，笔者在“宫城”一节中，是作为西宫所在的西苑墙曾引用过的，但在这一派“三重城”论者笔下，则成了平城居民为避难柔然(蠕蠕)犯境的夹在宫城和外部之间的中城了。

毋须讳言，笔者是一个对“三重城”论持反对意见的论者(可以称为“二重城”论者)。我们对于上述几条《魏书》的原始引文的理解是：首先，关于道武帝天兴三年(406年)六月条所载灏南宫条中之“规立外城方二十里”之内容，笔者认为这是一条规划，而非实际工程，而且根据上下文之间的关系，在灏南宫外围拟修建“方二十里”的“外城”，原本顺理成章，毫不违和。灏南宫所在黄瓜堆地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乃是北魏在盛乐时代就已着力经营的“小平城”。迁都以后，安排的新建项目亦很多(上文已备述)。作为战略要塞和首都副中心，规划建设一个“方二十里”的“外城”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。而且论规模，也与此役前后营建的东苑(周三十里)、西苑(周二十里)不相上下，甚至还小些。这让人怀疑，欲把“规立外城方二十里”的记述从灏南宫原句中拆出，去另证平城“外城”的存在，似有过度推演，缺乏实证，不得已移花接木之嫌。

其次，关于柔然吴提果犯边，邑人避走“中城”条。引文中之“七介山”，地近云中，位于今内蒙古阴山地区(约凉城县蛮汉山一带)。从七介山到平城，尚有300余里，且中有泰常八年所筑长城，以及“一宫一苑两垣”之阻隔，即：豺山宫、鹿苑、北宫垣、平城外郭(垣)，此时也都已有了城垣，其初衷都是为了防御柔然而设。“三重城”论者，何以知其所谓“中城”，不是此四者之一，而非得去找“西宫外垣”来硬充！更何况，西宫外垣能建方二十里之墙垣者，本已反证其不可能在宫城之内，更不可能夹在宫城和外郭之间。此类“硬充”之论，还须一驳。

第三，就常识来讲，如果平城在宫城和郭城之间真有一条所谓的“外城”亦或“中城”，那么，在理论上它就应该应该是首都雄起起气昂昂、最具标志性的“主城”，其象征意义当超过宫城、郭城。退一步说，假设灏南那条“方二十里”的设计也是专为“主城”而做的，那么，到了太宗时代，该是这圈“主城”竣工“亮相”的时候了！但是《魏书》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明确记载。却在泰常五年(420年)四月条，专门呼应了灏南宫的建成，“丙寅，起南宫”。另《太宗纪》泰常七年(422年)条还记录了“外郭”的筑成信息：“辛亥，筑平城外郭，周回三十二里”。这显然都与所谓的“外城”“中城”的设计风马牛不相及！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，所谓的“中间城垣”本就子虚乌有！

第四，关于平城外郭的记载，不仅见于核心文献《魏书》“主城”，还见于南朝(梁)史学家萧子显所撰的《南齐书》。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载：“其郭城绕宫城南，悉筑为坊……其郭城东西八里，南北十里。”此记载述极为清楚：环绕于宫城之南的，并非“外城”，而是明确明确的“郭城”。而且郭城呈矩形，东西八里，南北十里。这个规划与《魏书·太祖纪》泰常七年条的记录有一些差异，但与现代研究的实测距离(从仅存的平城北垣遗址到明清南城墙)更接近，故更加值得采信。

第五，尤为精彩的是，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—1905年)期间，清朝研究《水经注》的专门家、湖北宜都人杨守敬，在他的弟子熊会贞襄助下，并结合清朝前贤黄仪、顾祖禹、闫若璩、胡渭、全祖望、赵一清、戴震、董祐诚、汪士铎等学者对于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的研

究成果和考证实据，绘出了巨典《水经注图》。这一源流来自北魏郦道元注文的重要图典，将北魏平城的城垣体系作为都城形制的典型案例绘出(同一单元中还绘有郾城、洛阳、长安等)，图中，清清楚楚地描绘出了北魏平城“宫城+郭城”的二重城垣及其他56条重要地标信息。这张地图用流传有序的古元素与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的记载构成了1500年的“互文”。这是一条铁证，而绝非孤证或后世杜撰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平城所谓“三重城制”，实则是因核心文献记载的模糊性而造成的一座“海市蜃楼”。多少年来，论辩各方都在为一重幻影般的“城垣”而劳神费力，其实它本不存在！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，拓跋珪帝王会在短期内依照郾城、长安、洛阳的蓝本，建立起一座具有中原经典礼制规制和强大防卫功能的都城来，甚至可以创造出超越时代的更新特“模式”来。可惜，客观历史并非如此。相对来讲，能够揭示北魏平城城垣建设实际情况的，倒是那些从事实地研究的学人和来自北魏敌对双方的记载。如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载：“什翼珪(拓跋珪)始都平城，犹逐水草，无城郭。木末(拓跋嗣)始土著居处。佛狸(拓跋焘)破柔然、黄龙，徙其居民，大筑城邑。截平城西为宫城，四角起楼，女墙，门不施屋，城又无壁。”此段记载，出自敌对政权，所记或许会有一些贬损和轻蔑，但其具体描述应多基于使节之目击、商旅之传述及谍报之侦察，于关键数据上往往更具史料价值。考虑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，特别是新建都城百事繁杂，轻重缓急等客观实际，郦道元之所云，《南齐书》之所记，杨守敬之所绘，或许更加符合平城前期的历史真实。

太宗以及世祖时代，平城都的战略性质城防工程，除了“周回三十二里”的郭城，《魏书》卷三泰常八年(423年)条记：“二月戊辰，筑长城于川之南。起自赤城(今属张家口)，西至五原(今属包头)，延袤二千余里，备置戍卫。”世祖时代，太平真君七年(446年)六月，又“发宫、幽、定、冀四州十万人筑塞于塞围，东起上谷(今怀来)西至于河(河套)，广袤皆千里。”这两条“长城”除了担负畿内不受北方寇侵的任务之外，同时也起着与北方地区隔绝的作用。这表明北魏之国家意志已决心走向同中原地区实现一体化的道路。如此规模的两城，目的既备战当前，又顾及长远，这是当时最大的战略投入，所需国力可想而知，其意义当然也是划时代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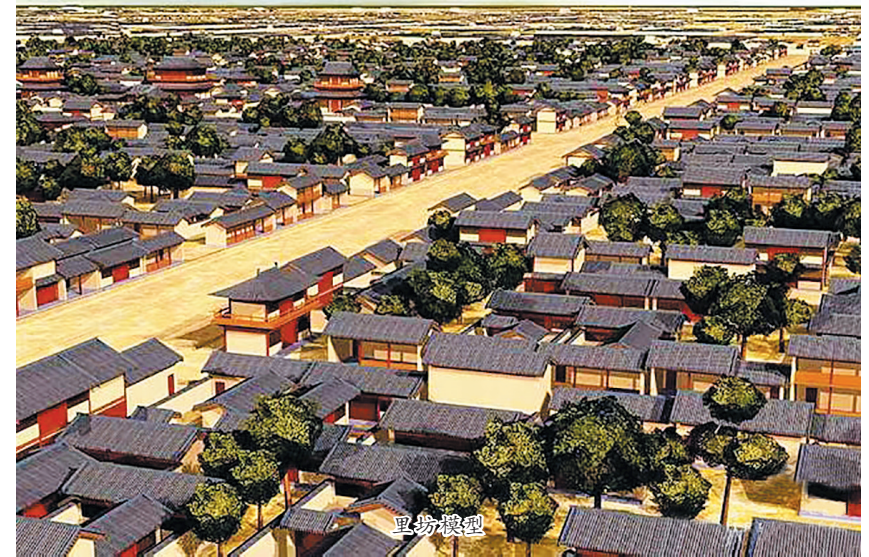
6. (里坊)里坊虽非平城建设中最先动工的工程，却是决定北魏能否在短期内实现其“北方中心城市”政治宏图最为关键的一环。其问题的实质，在于空前规模的人居安置。据相关研究和统计，北魏王朝在迁都前后，通过频繁战争，动迁人口逾二百八十万。其中，出于各种政治、经济与文化目的被特迁至新都平城的人口，竟达百万之众。在短时间里如此庞大的人口得到妥善安置，并使其转化为预设的生产力与统治基础，无疑是一项极其繁重且艰难的浩大工程。

既往研究多将平城里坊建设诠释为一项都城制度的革新，认为草原民族采纳中原人居方式，变“游牧”为“守土”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。然而，在笔者看来，平城里坊建设的首要驱动力，实为巨大人口压力下的现实诉求。百万新增人口多数来自太行山以东及黄河以西的汉族居民，欲将其快速安置并转化为服务首都的功能性群体，最佳且唯一的选择，便是实行“里坊制”。

由于中国古代史书写本质是“官人史”而非“平民史”，《魏书》等核心文献中对里坊的记载寥寥无几。目前可考的关键记载，仅见于上文“城垣”一节所引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：“其郭城绕宫城南，悉筑为坊，坊开巷。坊大者容四五百家，小者六七十家。其郭城东西八里，南北十里。”这段附于城垣之下的简略文字，揭示了平城里坊的三个基本事实：第一，平城东西八里、南北十里的外郭之内，除去公共设施全部用于建设里坊，以安置居民；第二，坊与坊之间开辟了必要的街巷；第三，里坊规模不一，或依据迁入群体的人数随机而定。此外，该记载与《魏书·太宗纪》中泰常七年(422年)筑平城外郭之事可相互印证，表明平城的里坊体系在明元帝泰常年间已基本成形，而非迟至太武帝时期。以上信息，构成了我们研究平城里坊的全部基础。

鉴于北魏平城里坊，至今未有考古遗址现身，文献又极度匮乏，我们只能依据公认的人口迁入数据与上述有限记载，尝试建立一个推演数据：

①设定迁入总人口为100万。首先，将阴山旧部、盛乐班底及后燕战争幸存者约20万人，依游牧习俗安置于



平北六镇及平城鹿苑，令其戍守；其次，将河北、山东、河西、甘凉迁来的汉族农户50万人，按“计口授田”政策分散安置于京畿田亩，立户农耕；其三，将新纳士人、僧侣及各类官奴约5万人，随其主人安置于宫城、园圃与寺观之中。最终，所余25万人，主要为掠夺而来的工匠、商贾(另加本地世家大族)，需新建里坊予以安置。

②将这25万安置人口以户均5人计，得5万户。再依《南齐书》所载，以大坊、小坊折中，取平均值每坊208户，则共需建造240坊方能完成安置。

③平城郭城总面积，据《南齐书》东西8里、南北10里，合80万平方米。按1北魏里约合435米换算，约为15.1平方公里。

④在此总面积中，扣除宫城、园林、水系、道路、商肆等公共用地(参考洛阳模式，保守估计占比60%)，则里坊实际占地为：15.1 × 40% = 6.04平方公里。在此有效面积内建造240坊，每坊占地仅0.025平方公里，直观呈现为一个边长约158米的正方形。在此范围内容纳208户人家，人均占地120平方米。

通过这一数模，我们可将文献中的历史碎片转化为清晰的空间结构。它揭示出：北魏平城居民生活在一种高密度、须囊括其住房、院落及在坊内共享的一切道路与公共空间。这绝非闲适的“田园诗”，而是由国家力量强力塑造的、带有军事化管制色彩的聚居模式。平城里坊，正是这一“高压型”都城在空间组织上的终极体现，即典型的“编户”。当然，这个“数模”仅仅是一种利用人口和土地基数所作的理论推演，真实的人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。事实上北魏统治者还有另一手“硬牌”可打，那就是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劳役：如太祖时代建造鹿苑、黄瓜堆副中心；太宗时代修筑郭城、两千余里北长城；世祖时代筑千里畿上塞围；高宗时代开凿云冈石窟；高祖时代的石窟续建和明堂建设，等等……这都是容纳数万人、十数万人、甚至几十万人的浩大工程，不仅可以有效消耗捆绑首都的劳动力，缓解通过战争手段再事劳力补充；战争一徙民——劳役——工程，这是帝国的“铁律”，是成就“伟大”的必由之路。

7. (御苑)御苑主要分布于宫城北、西、东三面，地处由平旷台地延伸至北部群山的缓坡地带。此地坡面如掌，沟壑平缓，植被丰茂，极宜营造苑囿。从规划设计看，此区域可视作宫城与北部广狭鹿苑之间的功能过渡带。初期或仅依其方位，泛称北苑、西苑、东苑，彼此互通，界限模糊，甚至可能允许平民进出。然随都城建设迅猛推进，尤其在太宗天延四年(407年)北宫垣(鹿苑南墙)建成，及至太宗时代，东西两苑亦相继划地筑垣，三苑终成皇家专属之禁地，



与民间彻底隔绝。

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《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》中，对平城三苑着墨甚多，考辨精深，字里行间不乏惊叹与欣赏。综合前田氏的研究与笔者实地考察，我们认为：平城“三苑”原为鹿苑与南部城市之结合带，功能定位相对模糊。其后渐次向西、东两翼拓展，并分别自北垣墙两端向南延伸，终成包抄武周山东麓与白登山西麓的超大型园林。其间，西、北两苑紧密相连，东、北两苑隔浑水相望，三者共同构成“一体三苑，半抱平城”的独特格局，使山川形胜与人文创造水乳交融，形成风光绝佳的帝都气象。

分而述之：在初始时，西苑规模恐为三苑之最，其主体建筑为著名的西宫(后称洛阳殿)，建成于天兴元年(404年)。前田氏考证表明，曰：“西宫位于西苑之内，而非宫城之中”。太宗拓跋嗣极喜此宫，常居此理政，并最终于此崩逝。至泰常年间，西宫历经监国太子拓跋焘的大规模扩建，并筑起周回二十里的西苑围墙，规制愈宏。后又于延和元年(432年)拓跋焘被立为太子时，再度修缮，“分西宫三分之一”，建成新的“东宫”——两宫各备侍卫，新东宫，亦开四门，瓦屋，四角起楼，形成两宫并立体系(这个体系已预示了十年后那场“太武灭法”、“恭宗幽闭而亡”的政治风暴)。北苑之主体建筑为北宫(即崇光宫)，建于皇兴元年(467年)至五年(471年)间。此处为献文帝即位后之“太上皇”居所，见证了平城中期复杂的宫廷权斗(今此地有上皇庄、下皇庄村落，疑其名有所由)。北苑另一亮点则为虎圈，设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(444年)，乃收容各州所贡虎豹猛兽之所，兼具观赏与可控狩猎之功能(约在今卧龙湾一带)。《魏书》载，文明太后冯氏曾伴显祖(献文帝)临虎圈，忽有逸虎几近御座，左右惊惶，唯太后神色不变，其场景之惊险，可想见当时观虎实况。东苑之主体建筑亦称东宫(非太子所居之东宫)，建成于太武帝天延二年(436年)，专门为东郊祭祖而设。它毗邻白登台——汉高祖刘邦曾被围困之处。泰常六年(421年)明元帝又发“京师六千人，起白登台(鹿苑)，东包白登，周回三十余里”。围墙干脆把白登山也包围起来，这是三苑中垣建最早、且规模后来居上之苑，成为皇帝拓跋嗣彰显孝道的礼制之所。

此三处御苑与四座别宫，其兴筑年代与功能特色，恰如一把钥匙，为我们解锁了北魏平城在不把帝王统治下的政治焦点与生活图景。三苑原本皇家官苑，后来贵戚功臣也有凭恩旨人居者，如北苑中之“白马城”(今名)，即疑为重臣“白马公”崔浩之居处。可想而知，“一体三苑，半抱平城”的独特空间格局，是何其极美尊贵。在即，足令时人仰慕。于今，也可使平城跻身中国最美古都之林，让人无限感叹。

